

邵伯周 著

茅盾评传

四川文艺出版社

茅盾评传

邵伯周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段百玲

封面设计：曹辉禄

版面设计：杨璐璐

茅盾评传

邵伯周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8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5 字数330千

1987年1月第一版

198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60

统一书号10374·265

定价3.10元

标准书号ISBN7-5411-0045-5/I·46

前 言

伟大的时代孕育出伟大民族的优秀儿女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
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列宁

亚洲东方的上空，群星璀璨，光辉夺目。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相继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也相继出现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五四”这个伟大时代所孕育出来的“巨人”。

“五四”这个产生“巨人”的伟大时代的到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时，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在

这一变化过程中，有两种互相联系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培养了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二是向西方学习，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融合。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维新是失败的。但教育制度的改革——废八股改试策论和开办新式学堂这两项“新政”，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得到推行，甚至还有很大发展。在洋务运动中，清朝政府就开始注意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模仿西方，开办了一些新式的军事学校和专门学校，鲁迅就是在一八九八年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的。一九〇一年，清廷命各省开办高等学堂、府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一九〇三年清廷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滥觞。一九〇五年，清廷正式宣布停止科举考试，推广新式学堂。除政府办学外，私立学校也开始出现。这样，新式的各级各类学校便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

洋务运动时，清朝政府就已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一八七二年起，就连续四年派了一百二十名学生去美国留学（其中就有詹天佑），一八七七年派了三十名学生和艺徒去英国学海军和造船（其中有严复）。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新政”之一的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也没有停止，人数反而年年增加。特别是去日本的，在“官派”留学生的影响下，还有许多人自费去留学。官费和自费留日学生，最多时达一万五千人。鲁迅就是一九〇二年官费去日本留学的。

清朝政府开办各级各类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自然是为了清王朝自身的利益，并且也确实培养了一批为封建统治者、

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人才”，甚至是“奴才”、“洋奴”，有些人则成为官僚政客和寄生虫。但更多的人则违背了办学者的心愿。他们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与封建士大夫完全不同，也与维新派完全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社会中从来没有过的、一股新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有着新的特点：

他们和下层社会接触比较多，对人民的苦难就有比较多的了解，因而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就更为强烈。留学生身处异域，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相对比，对民族危机就有更深的体会，因而也就有更为强烈的爱国思想。鲁迅一九〇三年在日本写的《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阖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表达了一个留日学生以身许国的坚强意志。他还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写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①表达了鲁迅的、也是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权益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们头脑中封建思想比较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的影响比较多。留学生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出国去的。吴玉章的：“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一首诗就表达了这一愿望。在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着宣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某种方便。比如在日本，二十世纪初的那几年间，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

^① 《鲁迅全集》第8卷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潮》等，就象春笋般出现。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这些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东西，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却还是那样新鲜。成为他们热烈追求的理想。

他们大都感到历史赋予自己的责任之重大。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诗正是这种责任感之表白。有的留学生公开发表文章宣称：“祖国之前途，其安危悉系于留学生”，“是留学界者，对乎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是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者是者”，“留学界中人负全体国民之委托，为全体国民所瞩望，……学成而后，尽出所能以过渡于全体国民，而共发达个人、国家、世界之三大主义，乃尽吾留学界之责任”。^①正是这种历史责任感，使许多留学生投身到民主革命运动中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基本上就是由这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组成的。

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科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一八九四年他在檀香山组织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时会员中有一些资本家，但孙中山离开后就停止活动。以后在香港、广州、东京、横滨、河内等地成立的兴中会总部和分会，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光复会的重要成员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华兴会的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和轰动一时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邹容等，也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的曾留学日本。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间，在武汉先后出现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群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和成员也大都是知识分子。

^①云窝：《教育通讯》（江苏）第4期。

这些革命团体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同时又与同盟会有联系。武昌起义，一举推翻清王朝，和这些革命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在新军中进行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

怎样判定这些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脑力劳动者看作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他说：“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①他又说：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些老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在戏院、娱乐场所，“演员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来说，是生产工人。”^②列宁曾经把俄国解放运动划分为三个时期：就是（1）贵族时期，（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3）无产阶级时期。列宁认为，“所谓平民知识分子就是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列宁指出，别林斯基是“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③他还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则是“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④可见列宁是把贵族以外的不同出身、不同职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称为平民知识分子的。斯大林则说“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⑤应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都是平民知识分子。当然，就他们的政治思想来说，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所进

①②《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443—444页。

③《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页。

④《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第9页。

⑤《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11页。

行的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勿庸争论的。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这一点来说，这个革命是失败了。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停止的，一个真正伟大的新时代——“五四”时代终于到来了。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①“五四”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批伟大的人物。

《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迅速形成蓬蓬勃勃的气势，迎来了“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加强，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力量迅速壮大。到“五四”前夕，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人，他们的斗争，已开始带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的性质，就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一样，只要时机一到，熔岩就会喷出地面。但在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暂时也还没有出现杰出的领袖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继续有所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一二年，全国有公私立大学四所，学生近二千人（包括预科），专科学校一百十一所，学生近四万人，中等学校七百所，学生近十万人。一九一六年，有公私立大学十所，学生近十万人，^②辛亥革命前后进入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有的升入高一

①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19卷第71页。

② 《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编，1934年版。

级的学校，有的毕业进入社会工作，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辛亥革命以后，继续有大批留学生出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称帝等政治斗争的影响，有所减少。但一九一六年间，仍有五千多人，留学欧美各国的则有所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法勤工俭学的就有一千七百多人。有不少人先后回国，在文化思想界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样，平民知识分子这一支队伍就壮大起来了。他们以“精神界的战士”的姿态，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呐喊”了。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伟大的“五四”时代到来了。从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和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平民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杰出人才。正是他们，把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和提倡白话文、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得到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的积极支持发动起来的。

陈独秀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安徽省教育厅长和安徽师范学堂校长，一九一三年因反对袁世凯被迫逃亡日本。一九一五年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半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发表了《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宪法与孔教》等论文，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武器，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一九一六年下半年，陈独秀应聘去北京大学任教。

《新青年》也迁北京。新文化运动迅速扩大了影响。李大钊于一九〇七年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一九一三年去日本留学，曾

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九一六年回国，任《晨钟报》主编、北京大学教授。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一九一八年间，与陈独秀一道创办《每周评论》，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经参加光复会的蔡元培，一九〇七年到德国留学，一九一二年回国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组织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抱“兼容并包”主义，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一九一六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沈雁冰，在一九一七年到一八年间，先后发表了《学生与社会》、《一九一八年的学生》等论文，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一九一七年一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加以响应。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鲁迅陆续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渡河与引路》等随感录，于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的文学革命运动也就蓬蓬勃勃的发展了起来。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沈雁冰等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的社会职业各不相同，他们的政治思想都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可是在当时，正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平民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就热烈地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了，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就是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一九年上半年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指出了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此时，李大钊在北京知识界中已有较高的威信，一些进步的学生团体都争取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如少年中国学会就是他于一九一八年六月间发起的。次年出版的《少年中国》，也由他担任主编。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学生联合组成的学生救国会（1918年十月）及其出版的《国民》杂志（1919年1月创刊），也得到李大钊的帮助。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创刊的《晨报》，也得到李大钊的帮助。

在这一年内，沈雁冰撰写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等文学论文，编写了不少童话。郭沫若在日本开始用白话写作新诗，参加文学革命运动。

青年学生在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斗争中，已经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九一九年春，“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无理决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李大钊是这一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一运动，很快由北京波及到全国。在天津，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周恩来，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在南开学校读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天津，参加学生运动。在武汉，恽代英在学生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在长沙，毛泽东的新民学会起了领导作用。毛泽东，一九一三年春到一九一八年春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去北京。一九一九年初回到长沙，任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事，并从事学生运动。刘少奇青年时期在长沙高级中学读书，一九一九年先后在北京、保定参

加五四运动。瞿秋白，一九一〇年在常州府中学学习，一九一七年到北京入俄文专修馆学习，参加五四运动。由北京青年学生发动的“五四”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并吸引、推动了工人群众和工商业者参加，形成为全国范围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彻底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民族资产阶级也在斗争中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

“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平民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有的消沉、有的退隐了，绝大多数是前进的，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以后，《新青年》大量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新青年》被改组成为它的机关刊物，又秘密出版《共产党》月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分别在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是南方宣传新思想的重要刊物。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一九年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陈望道，于一九二〇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于是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转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的广泛影响，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一种是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实际的工人运动。一九二〇年间，在北京（李大钊等）、上海（陈独秀、沈雁冰、陈望道等）、长沙（毛泽东等）、武汉（董必武等）、济南（王烬美等）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除在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推进工人运动。并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

运动结合起来。

一种是赴法勤工俭学。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二一年间，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多达一千七百人。其中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蔡畅等，在旅欧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回国后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

一种是组织文艺团体，出版文艺刊物。沈雁冰于一九二〇年改革了原属于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小说月报》，又和郑振铎、周作人等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彻底革新《小说月报》。郭沫若、郁达夫等留日学生，组织了创造社，出版《创造》季刊。一支新文学队伍出现了，新文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伟大的“五四”时代涌现出来的这一批平民知识分子，在尔后的实际斗争中，许多人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领袖。在亚洲东方的上空，出现群星灿烂，光彩夺目的景象。

恩格斯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巨人”的特征是“他们几乎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①。我国的“五四”时代，也正是这样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是这样

^①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445—446页。

的“巨人”，鲁迅、郭沫若、茅盾，也是“巨人”，他们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他们都站在时代的前列，有的用笔和舌，有的用剑，有的两者并用，进行英勇的斗争。但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并不是象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那样，“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而是和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一道，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光辉的胜利。使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兴旺发达起来。

列宁曾经指出：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获得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①

列宁这里提出的“保证”“个人的社会活动”得到成功的条件是什么？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斯大林也曾说过：“凡是新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他们才能创造历史。”②

我们认为，能够“保证个人活动”“获得成功”的条件，就是

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②《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页。

社会力量的配置情形，本质上就是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势。当杰出人物的个人才智与努力和新兴阶级的要求相一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也就是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一致的时候，他就能推动历史发展，也就是创造历史。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主观主义地、随心所欲地行事，他必须能“正确认识”自己所面临的“现成条件”，“懂得”去利用、发展有利的方面，避免、克服不利的方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具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否则，就会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当他一旦脱离实际，犯了主观主义错误的时候，也难免使历史运动遭受挫折。

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伟大人物，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就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登上历史舞台。而他们自己又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强大理论武器，用来正确地观察、分析自己所面临的“现成条件”，并且“懂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去利用、发展有利方面，避免、克服不利方面，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

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伟大人物，同样，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外，还在于他们能面对现实，使自己在文化、文学方面的活动，与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能够以批判的态度接受自己的民族传统，同时实行“拿来主义”，以宏大的气魄吸取外国文化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从而使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

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这里说的文学，是指整个文化。

平民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和崛起，是我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正是这一批平民知识分子的“风流人物”，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中的“风流人物”，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中的“风流人物”，发动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吸引并推动无产阶级参加这一爱国运动，吸引并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这一爱国运动；正是这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风流人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工人群众中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正是这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中的“风流人物”，谱写了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的光辉的新篇章。

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巨人”，是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因为“五四”这个伟大的时代赋予他们以伟大的力量，推动他们站到时代的前列，去担负起改变民族的命运，创造新的历史的重大使命；同时也因为他们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开阔的胸襟，不仅善于从自己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